

军 事 语 言 学

刘伶主编

军 事 语 言 学

刘 伶 主编

国 防 大 学 出 版 社

军事语言学

刘伶主编

*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牛栏山一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11.625印张·26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7-5626-0196-8/E·117

定价：4.80元

前　　言

语言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长河里，呈现出两种总趋势——分化趋势和综合趋势，看来二者似乎是相反的，实际上正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语言学脱胎于语文学(Philology)之后，便流向分工趋势。美国语言学家乔治·特雷杰(George Trager)对20世纪前期、中期欧美语言学各家的分科作了总结。

原型论

语音学：(1) 发音学(Phonation)

(2) 音素学(Allophonies)

(3) 音位学(Phonemics)

语法学：(4) 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emics)

(5) 形态学(Morphology)

(6) 句法学(Syntax)

语义学：(7) 组配(序列)(Collocation)

(8) 标记(Notation)

(9) 所指(参照)(Reference)

(10) 本体论(Hypostasis)

从语言学的全部发展史来看，这一分科图表并不那么完善。有许多学科并未包括进去。修辞学、风格学、词典学、文字学等等，在它的分科体系中是找不到位置的。

语言学的综合(或一体化)趋势，显现于20世纪初叶。

当然这同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空前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又日益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其突出特点是其边缘学科的诞生——原来两门独立的学科经过互相交叉渗透，产生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工程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均属于新兴的边缘科学。有人认为，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更全面系统地观察语言的各个方面，避免片面性，有助于语言科学的发展。

军事语言学是语言学与军事学交叉组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实际上是社会语言学的子学科。“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如何把军事语言学变做为我军官兵服务、推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力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不外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军际交往中的诸语言现象来观察、描述其性质、构成、来源及功能和衍化规则；一是研制军事语言形式化，逐步使军事信息自动化，直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编著者缺乏自然科学的应有素养，本书只侧重于阐发军际交往方面的内容，而有关人机对话的内容（如科学语言、编码等）则很少论及。

据我们所知，当前在我国，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可以说军事语言学仍然是语言科学中的弱项。军事语言丰富多姿也很有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丰富语言科学的又一个特种“宝藏”。我们应当从理论上到应用上加以考察和研究，使其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为构建语言学大厦的瑰宝，在语言科学的殿堂里大放异彩。当然，这块宝藏的勘察、发掘、铸炼，有待于军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切磋。即使这样，也需要数十年的进取开拓。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草成此稿，权当引玉之砖——实际上只是些碎坯粗沙罢了。

在编写此稿的过程中参考了有关社会语言学、军事学的论著，吸取了一些有益的观点和材料，这里不一一列举，谨向这些论著的编著者致以谢意。

最后，我们对热情鼓励并大力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国防大学出版社郑克礼同志，对关心本书出版的大连陆军学院院部首长和学术处、中文教研室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著者的分工是：

刘伶：第一、二、三、九章，第八章一部分；栾新传：第四、五章，第八章一部分；李启青：第六章；孙晓喻：第七章；黄志贤：第十章。全书由刘伶主编。

刘伶

1988年6月于大连陆军学院

目 录

前 言 (1)

上 篇

第一章 作为边缘科学的军事语言学	(3)
一、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3)
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学派	(5)
三、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10)
四、军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军事语言的性质	(21)
一、军事语言的功能特征	(21)
二、军事信息的重要载体	(26)
三、军事语言的封闭体系	(30)
四、军事词汇的来源	(33)
五、军旅化与全民化	(37)
第三章 军事信息的形态	(50)
一、军事信息的不同形态	(50)
二、语言符号形态	(51)
三、非语言符号形态	(54)
四、军事体态语	(64)
五、军事信息诸形态的互补	(71)
第四章 从军旅生活观察军事语言的变化	(77)
一、军事语言与军旅生活“共变”	(77)

二、战争是军事语言生存的土壤	(82)
三、科技发展使军事语言精密化	(88)
四、体制改革带来军事语言变化	(96)
五、军旅交往丰富了军事词汇	(103)

第五章 从语言变化探索军旅生活图景 (115)

一、军事词汇反映战争的风云变幻	(116)
二、军事词汇中军旅经济生活的印迹	(121)
三、军事词汇演变中认识变化	(126)
四、语言纯洁与军队精神文明建设	(131)

中 篇

第六章 规范军事语言 (141)

一、军语	(141)
二、军事成语	(151)
三、口令	(160)
四、制式称呼与称谓	(164)
五、新词举隅	(167)

第七章 变体军事语言 (173)

一、军事语言变体条件	(173)
二、军事语言变体途径	(180)
三、军人间称谓变体	(189)

第八章 军事语言表达 (208)

一、书面表达	(208)
二、口语表达	(244)
三、体态表达	(252)

下 篇

第九章 表军旅事物常用词考略	(265)
一、释“军”	(265)
二、释“兵”	(278)
三、释“将”、“帅”	(291)
四、释“车”	(301)
五、释“矛”、“盾”	(312)
第十章 表军事行为常用词考略	(326)
一、释“鬪”、“争”、“战”	(326)
二、释“攻”、“守”	(340)
三、释“胜”、“负”	(351)

上 篇

第一章 作为边缘科学的军事语言学

一、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从牙牙学语，到老，一直到死，除了聋哑人之外，人们都在说话。“也许由于它太平淡无奇了，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把它只看成象呼吸或者走路那样理所当然的事”^①，看成一件普普通通、无关宏旨的事。这是大错特错了。一般人常常习惯地认为：耸人听闻的事才是大事，日常习见的事就无足轻重，衣、食、住、行、说话……远不如探险、火箭发射、飞船上天那样重要，那样引人瞩目。我们从事某项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跳出这个习惯势力的圈子，重新观察一些现象，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正是这样做了，他从亿万人接触过千万遍的“琐事”——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研究语言也应该这样，从一个新的高度去认识语言，逐步发现它的功能和结构，揭示其本质。“一个人一旦打开了对人类言语的奇异、美妙和作用的眼界，他就再不会向奇闻轶事的文章问津了”^②。

语言研究虽然源远流长，不论中外均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是，把语言作为专门对象进行研究，即作为一门独立

①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页。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美国初版序言，iii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北京。

的学科，那还是近一二百年的事儿。研究语言的学问叫作语言学。从语言学的研究历史中，我们发现：传统语言学同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是综合的，往往包罗万象。随着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也象其他科学一样是分析的。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别，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语言学分科，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随着电子技术出现，许多科学又向综合研究方向发展，语言学同样也向综合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综合性分支学科，如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科，它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的产物，同时又与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语言学不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语言，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结构在交往环境中的变化规律。语言的社会理论研究早已有之，中国的荀子，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耶斯柏森、房德列耶斯、梅耶，当然，他们还研究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这一类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初，瑞士的语言学家德·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在他的学说影响下，在西方，语言的社会理论被冷淡，而语言的结构理论成为热门，结构语言学应运而生。个别结构语言学者根本否认语言的社会理论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承认它们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苏联，语言的社会理论被重视，而对语言的结构理论研究被淡漠。需要注意的是，苏联某些学者曾一度把语言社会理论研究庸俗化。截至20世纪6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仍然没把语言的社会理论研究当作语言的研究对象而排斥在语言学范畴之外。

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学派

早在1952年，赫兹勒(Hertzler)在美国中西部社会学学会上号召开展语言社会学研究工作，但是社会语言学正式在美国得到承认是在1964年。这一年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为期8周的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联合讨论会，从此语言的社会理论才作为独立的语言科学的分科而兴起，并被世界语言学界所公认，并正式命名为社会语言学(Social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因此，它的注意点不在于句子或篇章，而在于言语活动。换句话说，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作行为。试图从数量、频率、谈话的类型(代表不同话题、参加者和场合)等方面为充分理解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提供依据。”^①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异，海姆斯(Hymes)把社会语言学叫作“社会形成的语言学”。它的任务应该是：解释和分析不同社会集群的各种谈话方式以及使用这些方式的条件和意义。

吕叔湘先生曾高度评价社会语言学的地位，把它同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并举，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他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1980年第4期)一文中说：“直到五十年代，尤其六十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即为语言结构本身而研究语言——引者)为满

^①尤金·奈达(Engene. A. Nida. 1914—) 美国语言学家，本文引自他的《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转引自《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社会语言学自60年代建立起来，开展了理论研究，改进了调查与实验的方法，出版了不少论著，创刊了两本专门的杂志：一本是《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一本是《社会中的语言》。大学的语言专业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各国的百科全书收有专门条目，可以说社会语言学正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取得可喜的成果。

作为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研究考察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从60年代建立起至今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下面谈一谈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一般概况：

虽然研究者均以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是相通点，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理论依据、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不同，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学派”：

a、社会的语言对策。社会诸因素无时不在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一定时期仅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有意识地对语言施加影响，这就是社会的语言对策，诸如官方语言的选择，语言规范化的标准，语言政策的制定，文字的改革与创制，双语教育的规定，等等。由于研究的重点在于对社会施加影响这一方面，故有人称之为“语言的社会学派”(sociology of language)。美国的菲什曼(T.A. Fishman)就是代表，他是美国政府的语言顾问，主编《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苏联的社会语言学50年代初主要也从事一些语言的对策研究，如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创造文字，研究标准语的形式等问题；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工作也多起步于语言对策的研究，如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创制文字，等等；新加坡和菲律宾政府进行的“说华语运

动、大力推广普通话”，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等都属于语言对策这一范围之内。

b、语言变异的社会参数。这一“学派”着重探讨语言变异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语言特征可以反映人们的社会特征，而且这种制约关系呈现其固有的规律性。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Labov）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有人称他为“语言派”。他对美国纽约市不同社会阶层在不同语境中所发farm、car、park一类词中的元音后〔r〕进行了调查，发现在社会地位较低的商店中的营业员发〔r〕的比较少，低于20%，在中档的商店中的营业员发〔r〕的占51%，而在高档商店里的营业员发〔r〕的超过62%。这样，拉波夫把语言变异同社会变项及其风格变化联系起来，并提出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函数关系——任何一个变项的变化都会引起结果值的改变。近年来，拉波夫又对医生、病人之间的谈话进行语段分析。英国的伯恩斯坦（B·Bemstein）所研究的教育中的阶级关系问题，也列入此类。不过，拉波夫对伯恩斯坦的研究结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掌握不同的语言，认为工人阶级的儿童掌握的是“有限代码”，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儿童除掌握“有限代码”外，还掌握“精确代码”，并声称只掌握“有限代码”的工人阶级儿童，语言是有缺陷的，因此在认识上也是有缺陷的）进行了批评。他在《非标准英语的逻辑性》一文中以充分的论据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使用所谓的“有限代码”的工人阶级儿童也能十分熟练地运用抽象概念，在认识能力上并不亚于使用所谓“精确代码”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儿童，从而驳斥了某些受伯恩斯坦影响的学者所提出的黑人使用的英语是非标准的、有缺陷的错误观点。

c、语言的交际能力。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国从事

社会方面调查的海姆斯 (Dell·Hymes)。他对乔姆斯基的诘难，最核心的一点是：乔姆斯基只提出语法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交际能力，使用也有使用的规则，掌握这种使用规则的能力就是交际能力。这种能力有天赋的因素，也受后天的影响，从而他提出：“社会的多样性和语言能力的差异性两个术语，即语言交际能力的获得，往往因社会各成员的不同条件而呈现差别。他同乔姆斯基形式语法相对提出了“文化语法”。不过，海姆斯的研究兴趣仍在于研究人的头脑中的语言能力，只不过把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扩展开来罢了。换言之，乔姆斯基研究的是拟想中的人的言语能力，海姆斯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言语能力。他们的共同点都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放在研究视野之外。

d、人们互相交谈的模式。英国韩礼德 (M·A·K · Halliday) 属伦敦学派。他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风靡之际，没有随波逐流，仍继续他的语言功能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人们互相交谈的语言模式上，他说，不仅要“看到人们不仅说话，而且是相互交谈”^①。韩礼德研究的是社会相互交往中活生生的人，目的是描写与分析人们交往中语义蕴藏 (meaning potential) 的语言表达模式。

韩礼德的语言模式如下^②：

^{①②} 韩礼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转引《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第13页。